清史探秘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文化报社 合办

清代,九门提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职位,其掌管的步军统领衙门所承担的任务关系着皇帝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可以影响到皇帝的废立。唯其如此,九门提督在清代历次宫廷争权斗争中均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非满人、非心腹重臣,不能担任此职。

九门提督与清廷政争

杨东梁

清代,京师内城共有城门9座,分别为:正阳、崇文、宣武、朝阳、东直、阜城、西直、德胜、安定。京师的卫戍、警备和治安保卫机构叫"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衙门",通称"步军统领衙门",长官简称"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九门提督统领满、蒙、汉军八旗步兵和京师绿营的马步兵(即"巡捕营"),所部的具体任务是分泛驻守、稽查城门、缉捕盗贼、申禁巡夜等。

统领步军 位高权重

步军统领创设于清初,后经历了数次变迁。原来只统辖八旗的步兵营,到康熙十三年(1674),始兼提督京城九门事务(原由兵部管理),康熙三十年(1691),又兼管巡捕三营事务,官衔全称遂改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雍正七年(1729),官署定名为"步军统领衙门",十二年(1734),在宣武门内京畿道正式建立衙署,9年后迁至北城帽儿胡同,又称"北衙门"(同为负责审案的刑部因设在南城称"南衙门")。乾隆四十六年(1781),巡捕增设左、右两营,变成中、南、北、左、右5营,故该衙门的主官改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

九门提督负责京师的警卫、治安,初为正二品,嘉庆四年(1799)改为从一品。其统率的部队长期保持在3万人左右,且人员精干,装备精良。从机构、人员、职掌来看,步军统领衙门除衙门本部外,还下设八旗步军营、巡捕五营、内外城十六门管理机构和白塔山信炮管理部门。步军统领之下设有左、右翼总兵各一人,与步军统领同堂办公;八旗步兵营主要驻守内城,设有左、右翼尉各一人(秩正三品)。

巡捕五营分布于外城和四郊,总计23汛(每汛有官兵370人至580人不等)。中营驻扎于圆明园一带,由副将(从二品,隶属于总兵)一员带领,下分5汛;南营分防外城及南郊,下辖6汛;北营分防北郊,左营分防东郊,右营分防西郊,以上3营均各辖4汛。南、北、左、右4营设参将一人、游击一人。嘉庆四年,又添设左、右翼总兵各一人,左翼总兵节制南营、左营,右翼总兵统辖北营、右营。

顺治十年(1653),于白塔山(今北海琼岛)设置信炮5位,若京城发生暴乱、敌情、火灾、爆炸,则凭金牌"奉旨发炮";内九门也各设信炮5位。白塔发炮,则九门信炮齐鸣。京城驻防官兵闻炮声后,立即分区集合待命。乾隆八年(1743),信炮及其管理系统移交步军统领衙门。

正是由于步军统领衙门所承担的任务关系着皇帝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可以说,九门提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职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可以影响到皇帝的废立。唯其如此,九门提督在清代历次宫廷争权斗争中均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九门提督的人选极为重视,非满人、非心腹重臣,不能担任此职。

九门提督影响政局

清圣祖玄烨在位61年,皇子间展开了激烈的储位之争。皇太子两立两废,争储斗争错综复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病危,是日寅刻(凌晨3点至5点),急召诸王子及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隆科多至畅春园病榻前,谕令以皇四子胤禛即位。时胤禛正奉命去斋所致斋,准备代皇帝主持十五日的南郊大祀。当他闻讯赶到畅春园时,已是巳刻(上午9点至11点)。戌刻(晚上7点到9点)康熙帝去世,隆科多(胤禛的舅父)立即进言,让胤禛"先定大事",再办丧仪。为防止发生变故,时任步军统领的隆科多立命铁骑四出,自十四日至十九日关闭京师九门,全城实行戒严,直至二十日胤禛正式即皇帝位,步军统领衙门才解除了京师戒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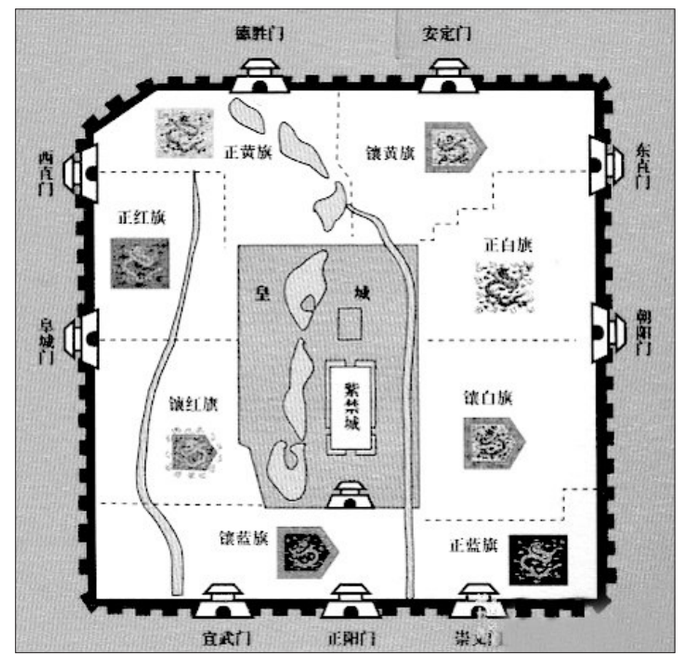
百余年后,清朝的统治早已进入衰世,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一方面,国内农民起义烽火连天,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东南半壁;另一方面,英法联军攻陷天津,逼近北京,咸丰帝的六弟恭亲王奕䜣被授予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京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议和期间,奕䜣的主要得力助手是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的文祥。文祥还兼署步军统领,被委以办理城防、维持秩序的重任。但当时的权力中心位于被称为"行在"的热河(今河北承德),一切政令都由实际操控大权的肃顺等人发出。不久,步军统领一职就落到了肃顺集团的核心人物——郑亲王端华的身上。

慈禧太后一生中发动过两次政变,一次是"辛酉政变",即联合恭亲王奕䜣一举推翻八大臣辅政体制;第二次则是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动的镇压维新派的"戊戌政变"。这两次政变都借助了由九门提督统率的禁军。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病死,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受遗命辅政。当时肃顺集团与两宫皇太后围绕"赞襄政务"还是"垂帘听政"展开了激烈斗争。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步军统领"一职显然又是势在必争的关键职位。由于谁也不能占据绝对优势,双方只能达成暂时妥协:九月初四日,端华让出步军统领一职,改由留守京师的瑞常担任,而端华则"暂署行在步军统领",仍统率热河行宫的禁军。经过第一阶段的较量后,慈禧太后和奕䜣决定回到北京后再发动政变。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热河行宫完全在肃顺集团的掌控下,而新任的步军统领瑞常则是由奕䜣、文祥举荐的,这意味着京师的警卫大权回到了慈禧太后、奕䜣集团的掌控中。果然,在回銮后的第二天,两宫与恭亲王便联手扳倒了以肃顺为核心的辅政大臣。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经慈禧太后同意,颁布了"明定国是"诏,维新变法正式开始。但是,维新变法的措施触动了守旧官僚的利益,慈禧太后随即加快了政变的部署。其亲信荣禄早在光绪元年(1875)就兼任步军统领,二十年(1894)再授步军统领,并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至戊戌年四月二十七日,荣禄署直隶总督,几天后又任文渊阁大学士,节制北洋各军。慈禧太后又命刑部尚书崇礼接过步军统领的职务,指挥京师禁军,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护军,派刚毅管理健锐营(常驻香山)。经过这番布置,慈禧太后已将京畿地区以及京师内外、宫禁要地的军队都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特别是新任九门提督的崇礼,素为慈禧太后赏识,是反对维新变法的清廷元老,他所指挥的京城禁卫军成了直接镇压维新派的刽子手。

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不经过军机处,直接给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崇礼下达密旨,令捉拿康有为。时康有为已离京南下。八月初八,逮捕了杨锐、刘光第、谭嗣同,初九又逮捕林旭。同一天,慈禧太后向步军统领衙门发出"上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也就是由步军统领衙门捕人,交刑部收监审问。在政变过程中,步军统领是镇压维新派的直接执行者。



京师内城9座城门分布状况

文祥(左)、隆科多(中)、荣禄(右)都曾任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

作者简介

杨东梁,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专著10部(部分合著),发表学术论文、文章百余篇。

■文摘

古代『万岁』一词含义的演变

闫廷亮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万岁"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词语。千百年来,匍匐于专制淫威下的臣民口中的"万岁"就是专指皇帝,谁也不敢把自己与"万岁"联系起来。其实,"万岁"一词开始并非是皇帝的专用词,它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战国以前,传世文献中并未有"万岁"之记载,但在一些铭文中已多有"万年无疆""眉寿无疆"这样的字眼。然而它并不是专对天子的赞颂,而仅是一种行文款式,铸鼎者皆可用。与此同时,"万年"一词也出现在《诗经》中,如"寿考万年""君子万年""天子万年""万寿无疆"等,从其语境可知,这大多是人们常用的祝福语。宋人高承就曾指出:"万岁,考古逮周,未有此礼。"战国以降,"万岁"一词开始成为一个较为流行的词语,它的含意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的字面含义,即祝福长寿长生的歌颂词;二是表示致敬赞叹的欢呼语;三是表示"死后"的讳称。此后,伴随着专制皇权的确立和加强,这样一个拥有多重含义的词语开始为帝王所独有,并逐渐成为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代名词。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最早名为"万岁"的人,是东汉章帝之子刘万岁,永元五年(93年)封广宗王,其年即薨,无子,谥"殇"。显然,这个刘万岁是个短命鬼,还未成年就命归黄泉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名为"万岁"的有南朝刘宋时任宁州刺史的周万岁、萧齐时某中丞何万岁、会稽郡吏王万岁、北齐后主时的韩万岁以及西魏文帝时叱咤疆场、深得皇帝恩宠、官居尚书左仆射位进柱国大将军的李远(字万岁)。《周书》卷二十五《李贤传附弟万岁传》记载西魏文帝在讨论营救东魏降将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李远提出出奇兵救援时,太祖(文帝)曰:"李万岁所言,差强人意。"这至少说明,在这一时期人们名曰"万岁"是并不犯讳的,而且还可能是取名的一种时尚。

隋唐时期也屡见名为"万岁"者。如隋朝战功卓著屡挫突厥、打败达头可汗后被杨素诬陷而死的太平公史万岁,唐高祖时和尉迟敬德一同降唐的刘武周部将张万岁,唐高宗时任梓州都督的谢万岁,唐玄宗天宝年间周玄珞之子周万岁,安史乱时坚守平原的颜真卿部将刁万岁等。然而在唐玄宗以后,文献中再也看不到以"万岁"为名者。

何以如此?有人认为一是武周时期连续以"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作为年号,以一种极其特殊的形式强化了"万岁"一词的神圣色彩,更是向天下士庶百姓宣告了这一名称的"皇家化"。二是至武曌、玄宗时期,科举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推行和完善,愈来愈成为唐代社会选举制度的主流。这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将儒学以政治、道德为核心的学说确立为标准答案的选人机制的长期推行,使儒学通过它全面渗透到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当中去,儒家传统的"大一统""君权至上"以及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不自觉地深刻规范着人们的思想。三是"中唐儒学复兴运动"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家所宣扬的圣贤之道不仅成为社会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中心,也成为人们精神信仰的中心。因此,任何不符合圣贤之道的行为都被视为大不敬。自然,已与最高统治者划上等号的"万岁",也就不能为他人所使用了。

至北宋时,"万岁"已完全为皇帝垄断专用。据《寇准传》载:一日寇准骑马出行,"道逢狂人迎马呼万岁",结果此事为寇准政敌张逊所知而告发,寇准被罢去同知枢密院事之职,降至青州任职。又据《曹利用传》载:北宋大将曹利用的从子曹汭,一次喝醉了酒,"令人呼万岁",被人告发,杖责而死。这两则史实说明,到宋朝,除了皇帝,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称呼"万岁"。自此,"万岁"定于皇帝一人。

揭开明代辽东马市的神秘面纱

里 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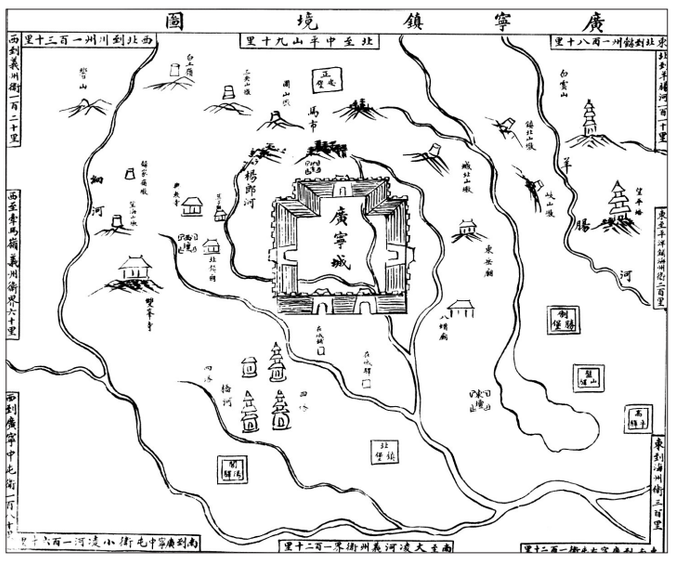
古代,马是战争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工具,受到人们特别重视。明《典故纪闻》记载,成祖曾问兵部尚书刘携:"今天下畜马几何?"携对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成祖曰:"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由此不难看出,在以骑射为主要武备的古代,马的数量是国家强盛的象征。

明朝建立后,十分重视马政建设,为得到品种优良的战马,在民间首创了代官养马制度。但由于代官养马制度无法解决明初战事频繁、马匹奇缺的矛盾,永乐初年,又转而大力发展朝贡贸易。由于明朝政府对各边区少数民族采取招抚政策,凡来朝贡马者均给予重赏,故贡马者争先恐后。

随着朝贡贸易的发展,边区少数民族来京贡马,路途遥远,运马艰难,越来越成为制约朝贡贸易发展的瓶颈。为此,永乐三年三月,明成祖饬令兵部:"福余卫指挥喃不花等奏其部属欲来货马,计两月始达京师。今天气向热,虏人畏夏,可遣人往辽东谕保定侯孟善,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直即遣归。"广宁、开原马市的设立,方便了明朝向东北边区少数民族购买马匹,因这些马市大部分设在辽东,故统称辽东马市。

最具规模的互市场所

万历年间,辽东马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广宁设一关一市,以待朵颜、泰宁等夷。开原设三关三市,以待福余西北等夷。开原迤东至抚顺设一关市,以待建州等夷。"此后,明政府又相继建立了宽甸马市、清河马市、辽阳马市等,而辽东马市成为当时最具规模的互市场所。



从明嘉靖年间绘制的《广宁镇境图》中,可见当时马市的位置。

辽东马市管理较为严格。"凡诸部互市,筑墙规市场"。市场内设有管理机构,立有市规市法,并设有马市官专司收买兀良哈和女真各卫马匹。各少数民族来市马者,将马匹及其他货物赴官验放后,方准入市交易。辽东马市设立之初,每月初一至初五开市一次。万历时开市日期日益增多,交易数额也日趋扩大。

为鼓励东北少数民族开展互市贸易,明代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善价易之""务使客商有利,夷价无亏"。明初所市之马,分上上马、上马、中马、下马、驹5种,上上马值米五石、布绢各五匹,驹值米一石、布二匹。由于价格规定得较合理,"至是来者众",马匹的成交量越来越多。二是实行"马市抽分"制,将"抽分"银两作为抚赏之费,奖励恪守条规的守市人员,以此调动他们维持互市秩序的积极性。每当市易"即毕",便对朝贡或互市的女真人置备酒食、牛羊以为慰劳之资 。三是"市本"充足。明朝政府的"市本"主要由管理马政的机构——太仆寺发放,据《皇朝马政纪》所载:在互市贸易中,"各边年例市本每年二十余万"。成化年间,因"市本"严重不足,政府停免了陕西、山西马市,而"辽东仍旧"。

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辽东马市日益繁盛,逐步由单一的"马市"发展为综合市场,马市性质也由"官市"向"民市"过渡,互市商品的种类也日益增多,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边贸市场。

女真崛起的重要因素

明初,建州女真主要以狩猎、畜牧和采集等传统经济为主,农业经济由于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种种不利因素的限制,始终处在较低水平,粮食严重不足,必须用当地的土特产到外区交换而来。辽东马市的出现,为女真与汉民族的商品交换提供了场所,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明永乐初年辽东马市开市后,女真人用马匹换取粮食,最好的马一匹可换米15石,最次的马可换米8石。明天顺二年(1458年),鉴于建州女真人要到马市交易必须长途跋涉到开原或广宁,很不方便,明朝在今抚顺城东官岭一带开设了抚顺马市。抚顺开市初,一日不过数十人,及万历年间,入市者动辄数千人,基本上是三日一市,每次开市都生意兴隆,非常热闹,四面八方商贾云集。女真以自己的人参、貂皮、松籽、木耳、马匹等土特产,换回粮食、布、盐、铁器等生产、生活资料。据档案记载,仅在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的17次马市交易中,女真人就买进铁铧4848件;同月的29次买牛交易中,买进耕牛430头。

通过经济交流,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特别是耕牛和铁制农器的大批输入,女真人不仅获得了生活的必需品,也使农业水平迅速得以发展,"户知稼穑,不专以射猎为生"。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曾说:"非抚顺马市则建州不得发达。"

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明代档案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七月十二日,"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一名,牛一只,价银二钱八分……"档案中提到的夷人"叫场",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觉昌安生于明正统年间,在部族间的互相争夺中,曾率族兵铲平建州女真中的硕色纳、加虎二强部,称霸建州女真。他是明朝委任的建州左卫官员,常率领部众进入辽东马市贸易,以畜产品易换麻布、粮食,领取抚赏的食盐、红布、兀剌等物。

努尔哈赤也是从小练得一身好武艺,并且经常到深山打猎,然后把山货带到马市易卖。这期间,努尔哈赤接触到了很多汉人,并对明朝官员、商人和一般老百姓的想法和生活习惯十分熟悉。通过互市贸易,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努尔哈赤的视野。马市惠及努尔哈赤的不仅是家乡社会经济的进步,也使努尔哈赤对另一个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努尔哈赤日后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明朝开设辽东马市是加强边防、巩固统治的需要,但客观上却为女真经济繁荣搭设了桥梁。建州女真在明代后期能突飞猛进地发展,无疑得益于辽东马市。万历年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并攻陷抚顺、辽阳等地后,辽东各地马市基本结束。

(摘自《中国档案》)